

发展研究专题

世界银行发展知识的推广： 基于权力视角的分析

李隽旻 崔一得

内容提要：为什么多边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提供的“发展知识”能被受援国采纳并形成约束力？发展知识如何经由国际组织向受援国推广？既有发展援助研究探讨了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接受，以及发展知识推广的具体形式，但仍缺乏能够展示国际组织与受援国间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类型学构建的关于发展知识如何推广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表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强制”“社会化”“定位”与“定义”四种形式进行发展知识推广，这四种形式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发展知识的推广内嵌于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权力互动之中。世界银行在秘鲁推广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知识时，以其接受参与式预算作为贷款的条件（强制），塑造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共识及认知共同体（社会化），形成关于参与式预算的优势性结构（定位），提供关于参与式预算的规范性话语（定义）。这一案例表明，多边援助机构向受援国推广发展知识是基于权力进行的。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新兴国家探索真正尊重受援国主体性的知识推广与合作模式。

关键词：多边援助 发展知识 世界银行 权力话语 秘鲁参与式预算

作者简介：李隽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崔一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6)02-0057-2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发展援助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多边发展援助已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多边发展援助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广泛肯定；另一方面，随着新兴援助主体与多元融资工具的涌现，传统主导机构开始面临合法性挑战。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由此被提出：为什么有些“发展知识”（如“参与式发展”^①、“善治”^②）能够被众多受援国采纳并形成约束力？这些发展知识究竟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完成从理念到实践的跨越？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有助于刻画多边发展援助的具体实施机制，还有助于理解国际组织的知识生产如何嵌入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之中。

本文选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多边援助机构即世界银行为分析对象，探讨以多边援助机构^③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如何实现发展知识的推广。选择以世界银行为解释性案例的理由有三。第一，世界银行具有巨大的政策影响力。世界银行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多边发展融资平台，更通过研究报告、贷款与技术援助等多元工具持续塑造全球发展格局。^④第二，世界银行从事密集的知识生产活动。凭借其庞大的研究部门与数据资源，世界银行发布的旗舰报告、指标体系与评估框架等往往被各国政府与学术界视为权威参考。^⑤第三，世界银行已对其发展知识实现了较高度度的制度化，其内部已形成一整套关于“何为发展、如何发展”的话语体系与操作手册。^⑥因此，世界银行为观察发展知识的推广与扩散提供了相对封闭而完整的“实验场”。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发展”在本研究中被界定为“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并进一步延伸至从全球层面改善社会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⑦。该定义源自世界银行的官方表述，

① 郭占锋 《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角下的国际发展项目》，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第130-139页。

② 汪淳玉、王伊欢 《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4-106页。

③ “多边援助机构”的核心子集为“多边发展援助机构”。为行文简洁，本文用“多边援助机构”指代“多边发展援助机构”。为行文方便，文中有时也用“国际组织”指代“多边发展援助机构”。

④⑤ 宋锦 《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优势和主要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6期，第23-25页，第25-27页。

⑥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3-167.

⑦ 徐佳利 《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132页。

既体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强调，也涵盖了其对教育、卫生、环境等多维福祉的关注。其次，“发展知识”是指“关于发展的想法、事实、专业知识和判断”^①，它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操作指南，也包含规范层面的价值判断。例如，“善治”意味着透明、问责与法治。基于以上界定，本文假定世界银行已被广泛视为一个内部高度一致且有能力对外施加影响的单一行为体。因此，本文不讨论发展知识在世界银行内部的生成、竞争与演化过程，而是聚焦于世界银行如何凭借已拥有的知识储备，通过制度化设计、资源分配与话语建构，推动受援国接受并实践特定的发展知识。

一 文献综述：发展知识的生产、接受与扩散

为深入探讨世界银行如何推动受援国接受并实践特定的发展知识，本文首先需要梳理与多边援助机构及发展知识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

（一）关于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接受

目前关于多边援助机构及发展知识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研究聚焦多边援助机构，考察其如何生产发展知识。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这些国际组织如何在特定国际环境中、在自身或外界的压力下生产出可被推广的发展知识。例如，有学者指出世界银行通过其内部的专家小组来生产专业性的发展知识。^② 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经合组织自身定位的转变指出，该组织通过建立三方合作项目数据库、举办高层论坛、引领国际发展议程等方式，生产并提供发展知识，以此完成自身从“制度构建”到“知识供给”的角色转型。^③ 另有学者将目光转向新兴的发展援助机构，指出新兴发展援助机构通过制度设计、创新治理结构、与传统开发银行合作等方式，生产或背书符合其理念的发展知识，并增强这些知识在全球治理中嵌入的深度。^④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发展知识的供给端，即国际多边援助机构以何种方式生产出这些发展知识。

^① M. Alavi and D. E. Leidner, “Review: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 in *MIS Quarterly*, Vol. 25, No. 1, 2001, pp. 107 – 136.

^② 汤蓓、扈赫扬 《制度环境与国际组织的知识生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6期，第137页。

^③ 郭语 《OECD 在国际发展中的角色转型：从制度构建到知识供给》，载《全球化》，2025年第3期，第55 – 56页。

^④ 苏雅文、薛志华 《亚投行发展话语权的确立、困境及提升路径》，载《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5期，第57 – 60页。

第二类研究主要考察由多边援助机构生产出的发展知识体现怎样的发展理念、反映谁的利益主张。这类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起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知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在这一理念下，“发展”被视为个体的责任，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提升“欠发展”个体的发展能力，多个个体能力的提升就可形成群体的发展。这一过程将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而那些促进这一过程的外部行为体被视作中立、客观的。^① 蕴含于发展知识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经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推广，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与改革的指南。^② 其次，与新自由主义相伴，这些发展知识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西方视角下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源自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并将西方与其他未发展的地区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的等级秩序。在这一层次上，发展知识被视为一种追求“合意社会”的“进步观念”，在现代被西方逐渐内化为一种全球治理实践模式。^③ 因此，在西方主导的发展治理实践中，基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秩序也通过发展知识的表达与应用，内嵌于发展援助的实践进程中。^④ 最后，这些发展知识在根本上体现并维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以美国为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美国对发展议程的主导中^⑤，还体现在发展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在世界银行打造“知识银行”的改革中，美国通过干预发展知识的生产与表达，使这些发展知识符合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⑥ 综上，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发展知识本身，即多边援助机构生产的发展知识在本质上体现了怎样的理念、服务于谁的利益。

① Elise Klein, “The World Bank on Mind, Behaviour and Society”,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8, No. 3, 2017, pp. 481-501.

② Mark T. Berger and Mark Beeson, “Lineages of Liberalism and Miracles of Modernisation: The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Trajec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bate”,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3, 1998, pp. 487-504; Margath Walker (ed), “Neolibe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ical Assistance: Constructing Communities of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 in Oaxaca, Mexico”, in *Geoforum*, Vol. 39, No. 1, 2008, pp. 527-542; 刘宁 《国际发展援助的转变——目标、资源与机制》，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2期，第113-114页。

③ 徐秀丽、李小云 《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第94-103页。

④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thony Payne and Nicola Phillips, *Develop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⑤ Robert Hunter Wade,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The Fight over People and Ideas”,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2, 2002, pp. 201-229.

⑥ 李华 《“知识银行”战略的实质：服务还是控制？——兼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载《财经研究》，2016年第9期，第45-47页。

第三类研究关注受援国，考察其如何对多边援助机构提供的发展知识进行本地化改造，使其能够立足本国国情，助力自身发展。知识的本地化是政策得以移植的重要条件，因为本地化意味着权力关系与制度条件的重新协商，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被翻译然后重新嵌入并适应新的语境。^①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转译适应”这一概念，来描述发展知识在受援国被本地化改造的这一过程。^② 在过去，由于多边援助机构中的西方专家将发达国家的经验视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发展知识，忽视地方发展知识生产的能动性及外部知识的本地化适应，其援助项目的实施屡屡受挫，如世界银行在莱索托实施的农业援助项目。^③ 晚近以来，这一局面正因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格局中影响力提升而有所改变，发展援助的在地化在经验和理论上都更加受到重视。^④ 综上，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发展知识的接收端，即作为发展知识接收方的受援国如何使其适应于本地的发展语境。

前文所述关于多边援助机构及发展知识的三类既有研究已较为充分地覆盖了发展知识本身及其供给端和接收端，但多边援助机构如何使受援国接受发展知识，即发展知识在两端之间的推广过程，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二）关于发展知识的推广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探究发展知识的具体推广形式，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承载发展知识推广的具体倡议或具体项目。换言之，发展知识可以通过多边援助机构具体议程的倡议或具体项目的实施而为受援国所接受。以世界银行为例。在议程倡议方面，世界银行通过将自身打造为“知识银行”，促进全球发展知识的共享与流通。^⑤ 以这一自身定位的转变为基础，世界银行积极构建知识共享的网络平台，以实现知识资源与相关数据

^① Cristina Temenos and Eugene McCann, “Geographies of Policy Mobilities”, in *Geography Compass*, Vol. 7, No. 5, 2013, pp. 344 – 357.

^② Izumi Ohno, “Introducing Foreign Models for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from Translative Adaptation”, in Izumi Ohno (ed.), *Introducing Foreign Models for Development: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ge of New Technology*, Singapore: Springer, 2024, pp. 3 – 45.

^③ Mamadou Diawara,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Loc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15, No. 2, 2000, pp. 361 – 371.

^④ 周弘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72 – 187页；徐振伟 《发展援助在地化：平行经验分享理论的改进——以巴西在非洲的农业合作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133 – 159页。

^⑤ Dieter Plehwe, “A Global Knowledge Bank? The World Bank and Bottom-up Efforts to Reinforce Neolibe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Era”, in *Globalizations*, Vol. 4, No. 4, 2007, pp. 514 – 528.

的共享。^① 在项目实施方面，世界银行在技术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发展政策连同其中的发展知识移植给受援国。^② 第二，基于具体倡议或具体项目的实践经验，发展知识的分享成为制度化的推广模式而被遵循。知识分享是指多边援助机构在发展项目实践过程中创造、保存并推广发展经验知识的过程。^③ 以世界银行为例，知识分享已成为世界银行促进其知识推广、为受援国提供发展策略，进而扩大其发展知识生产优势的重要渠道。^④ 因此，发展知识通过多边援助机构的“知识分享”这一方式而被受援国接受。综上，目前对发展知识推广的研究主要关注多边援助机构发起的议程与实施的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国际组织的“知识分享”这一具体推广形式的认识。

由上述梳理可见，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具体的知识推广形式，而对于知识如何推广、通过何种动力推广等问题尚未进行充分讨论。因此，进一步探索发展知识推广的具体机制不仅能够提供关于发展知识推广的总体视角，还能够刻画国际组织与国家间互动的具体机制与过程。

二 理论框架：权力与发展知识的推广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类型学，在发展援助格局中存在知识推广的四种形式，即“强制”“社会化”“定位”与“定义”，分别对应于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这四种权力互动机制，发展知识的推广过程实际上就是权力运行的过程。换言之，发展知识的推广机制是基于权力运行的。

^① Kenneth King, “Banking on Knowledge: The New Knowledge Projects of the World Bank”, in *Compare*, Vol. 32, No. 3, 2002, pp. 311–326; Alex Wilks, “From the Adam Smith Institute to the Zapatistas: An Internet Gateway to All Development Knowledge”, in *Compare*, Vol. 32, No. 3, 2002, pp. 327–337.

^② Adrian Robert Bazbauers, “World Bank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 Relational Dynamics of Policy Mov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37, No. 4, 2017, pp. 246–259; Adrian Robert Bazbauers, “World Bank Technical Assistance: Participation, Policy Movement, and Sympathetic Interlocutors”, in *Policy Studies*, Vol. 41, No. 6, 2019, pp. 567–585.

^③ 徐佳利 《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126–154页。

^④ 杨娜、程弘毅 《国际组织的非核心职能拓展——以世界银行参与全球治理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0期，第18–19页；马文婷、阚阅 《世界银行教育援助的价值取向、规范扩散与实践保障——基于“知识分享”的视角》，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58–167页。

（一）权力的类型学与知识推广的实施过程

1. 权力的类型学

要为多边援助机构发展知识推广的实施过程打造一个具备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框架，首先需要对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分类。在刻画不平等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时，权力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迈克尔·巴内特和雷蒙德·杜瓦尔的权力分类学^①有助于解释发展知识推广的互动机制。巴内特和杜瓦尔基于“权力借以施展的社会关系类型”和“权力产生效果的直接性”两个维度，划分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四种类型，分别是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见表1）。

表1 权力的类型学

		关系类型	
		直接	间接
权力的 实施路径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强制性权力	制度性权力
	权力构造的社会关系	结构性权力	生产性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 蕴含在权力互动中的发展知识推广

发展知识的推广机制是基于权力运行的，因此，不同类型的权力决定了不同的发展知识推广形式。

第一，通过行为体间互动，直接产生行为效果的强制性权力。实施强制性权力的行为体通常凭借其掌握的物质性、象征性或规范性资源，直接对另一行为体的行动或处境施加控制，迫使后者做其原本不愿做的事。^②强制性权力强调行为体之间的直接互动与“支配—服从”关系，它既可表现为军事胁迫，也可表现为经济制裁或道德羞辱等形式。在发展知识的推广中，国际组织通过一系列受援国必须服从的工具去影响并塑造受援国的发展政策，就是这种权力关系的体现。本文将与强制性权力相对应的知识推广形式命名为“强制”。

第二，通过行为体间互动，以间接或扩散的方式产生效果的制度性权力。行使制度性权力时，行为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规则与程序，间

^{①②}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39–75, pp. 49–51.

接且远距离地影响其他行为体的选择空间。^①与强制性权力不同，制度性权力不再依赖面对面的直接强制，而是借助制度的议程设定、规则偏向与路径依赖来产生持久而隐蔽的控制效果。在发展知识的推广中，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多种制度安排使受援国学习并接受发展知识，这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制度性权力。本文将与制度性权力相对应的知识推广形式命名为“社会化”。

第三，以构成行为体各自能力与利益的方式运行并直接产生效果的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描述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互构关系：特定结构（例如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中心—边缘结构）直接决定了处于不同位置的行为体所享有的能力、资源与利益。^②因此，在结构性权力下，处于支配位置的行为体无须主动施压，结构本身即赋予其优势；而被支配者别无选择，往往只能接受并再生产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就发展知识的推广过程而言，国际组织通过物质、知识等优势所奠定的结构落差而达成的知识推广，便体现了结构性权力的运作。本文将与结构性权力相对应的知识推广形式命名为“定位”。

第四，同样以构成性的方式运行但间接产生效果的生产性权力。生产性权力通过广泛、分散的话语与知识体系，持续地塑造所有行为体的身份、利益与可能的行动领域。^③生产性权力并非由单一主体掌控，而是在日常的语言、规范、分类中不断生成新的主体类型，即在国际关系中塑造出“合乎规范”的行为体及其“理所当然”的行动。当多边援助机构向受援国推广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话语并将其中的标准和指标定义为“客观”“公正”之时，生产性权力便行使于其中。本文将与生产性权力相对应的知识推广形式命名为“定义”。

（二）发展知识的四种主要推广形式

发展知识的四种推广形式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行动模式——“强制”与“社会化”这两种形式主要发生在多边援助机构带有明确意图的推广行动中，而“定位”与“定义”这两种形式则更多地出现在其未明确表达意图而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推广行动中。这两种行动模式分别对应着权力的直接互动与间接互动。

1. “强制”与“社会化”

发展知识的第一种推广形式是“强制”。“强制”是最易辨认的推广形式，指的是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受援国必须服从的一系列工具来完成发展知识

^{①②③}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51–52, pp. 52–55, pp. 55–57.

的推广，以此影响并塑造受援国的发展政策。多边援助机构常利用其政策工具，通过附加条款使受援国在接受经济援助的同时改变国内政策，使其包含多边援助机构所认可的发展知识与理念。在这种形式的推广中，发展知识被当作实体而实现了在两个行为体间的传递。之所以能实现这种传递，正是因为多边援助机构向受援国行使了强制性权力。

发展知识的第二种推广形式是“社会化”。相较于“强制”，“社会化”更注重在多边援助机构的规则安排下让受援国习得发展知识。在这一形式下，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各类机制平台动员受援国相关行为体（包括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社会团体、媒体乃至公众）学习发展知识，从而形成掌握较为一致发展知识的“认知共同体”^①。在这一共同体中，各行为体共享对发展的理解与政策工具的使用方式。

多边援助机构以社会化的形式向受援国推广发展知识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设立新的发展议程，以此吸引各行为体对新领域内发展知识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多边援助机构可能创立新的行为规范从而成为知识代理者^②，这些规范进而成为关于发展的共识。二是设立多种学习平台与培训机制并在其中分享、传播知识与经验，使发展知识能够被政策制定相关方广泛学习。通过发展知识的社会学习过程，多边援助机构间接影响受援国对这些知识的接受及其国内发展政策的制定。三是通过技术援助项目培训受援国相关人员，发展知识在此过程中被社会化地转移至受援国内。在这种推广形式中，多边援助机构通过设立各种机制安排，动员各行为体在其中学习发展知识；知识在此政治实践中成为一种关系性的社会网络^③，而知识学习则成为构建这一网络的规则。因此，发展知识的社会化不仅展现了知识被接受的动态过程及其微观基础，即个体的学习与应用过程，同时也是制度性权力施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边援助机构构建的机制成为发展知识得以社会化的平台，而知识学习的规则成为该机制得以巩固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支柱。

^①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p. 3 - 7.

^② Dennis Niemann and Kerstin Martens, “Soft Governance by Hard Fact? The OECD as a Knowledge Broker in Education Policy”, i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8, No. 3, 2018, pp. 1 - 17.

^③ David Mosse, “Knowledge as Relational: Reflections on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1, No. 3, 2014, pp. 513 - 523.

综上，强制与社会化这两种推广形式主要出现在多边援助机构带有明确意图的行动中，发展知识在其中作为客体被国际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行动传递给受援国。根据前述权力类型学可以看到，通过带有明确意图的行动推广的发展知识主要依赖于行为体间基于接触互动的权力机制。

2. “定位”与“定义”

发展知识的第三种推广形式是“定位”，其前提条件是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在发展援助格局中的不平等地位。在这一等级结构中，多边援助机构是优势一方，其所提供的发展知识获得了由结构所支持的合法性，进而藉由二者之间的“位差”自然地流向地位较低的一方，即受援国。

多边援助机构处于优势地位的等级结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多边援助机构具备资金、人力等资源上的优势。多边援助机构为众多接受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与融资，拥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与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①其次，多边援助机构因其职能而具备发展知识上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知识资源储备，还体现在它们可以动员自身资源，如专家学者、在地项目等，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发展知识，推动知识生产。^②最后，这一等级结构在话语和实践中不断被巩固、再生产。这意味着当发展中国家接受来自多边援助机构的援助时，也就接受了这一等级结构的潜在制约。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会不断塑造处在不同位置的行为体的主体身份。一方面，多边援助机构以其资源与知识不断强化自身“拥有丰富经验的主导者”身份，使其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另一方面，受援国在接受援助时被迫接受“落后”“贫穷”等身份特征标签，使得受援国的从属地位不断被再生产。^③综上，在发展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等级结构中，发展知识以不同主体定位的形式被推广并具备合法性。这不仅体现出国际关系中结构性权力的施展过程，还以知识推广的方式强化了国际发展援助格局中的不平等性。

与“定位”这一形式息息相关，发展知识还有第四种推广形式，即“定义”。它指的是多边援助机构通过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话语，让行为体认为其中

^① 杨娜、程弘毅《国际组织的非核心职能拓展——以世界银行参与全球治理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0期，第14-15页。

^② 宋锦《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优势和主要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6期，第25-27页。

^③ Tristen Naylor, “D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The Use of Power and P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1, 2011, pp. 186-191.

关于发展的标准或指标是客观且自然的。这些话语拥有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如果受援国接受了这些标准并将其视为客观且自然的，那么，这些标准所内含的发展知识与理念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被受援国接受，这些话语也借此强化了合法性。

作为发展知识推广形式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涵。一是定义发展援助的对象。在多边援助机构的实践中，发展援助的对象被定义为那些贫穷的、需要发展的国家。在识别这些对象的情境中，发展援助的话语才得以建立。^① 这些对象因其被定义的自身“缺陷”而具备了成为发展知识推广对象的首要条件。二是定义发展援助的技术工具，即一系列关于发展援助的条件与标准。以量化指标为代表的技术工具被视为中立的，并因其客观性而具备合法性。^② 受援国在接受这些技术指标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内含的发展知识与理念，而这些知识含有多边援助机构对“发展”及其治理的偏好。三是定义发展知识本身。发展知识被视作由一系列特定概念、术语及其形成的话语构成的集合。多边援助机构在定义这些知识的过程中，赋予这些知识特定的含义及自身偏好的特定发展方式。^③ 如果受援国认同这些发展知识，它们同时也会接受蕴含于其中的特定理念与发展方式。综上，“定义”这种推广形式实际上规定了受援国所接受的发展援助的内容、手段与目标。

“定位”与“定义”这两种推广形式的共同前提是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不平等结构。如前文所述，“定位”这一推广形式依托于两个行为体之间因不平等而形成的“位差”。“定义”这一推广方式亦是如此。多边援助机构所提供的技术话语之所以被认为是“客观的”，是因为它们拥有话语主导权，而这一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定义”所形成的话语还会推进定位所体现等级结构的再生产。总之，发展知识的后两种推广方式依赖于共同前提且彼此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关系。

总的来说，当国际组织使用“定位”与“定义”这两种形式推广发展知

^① 唐丽霞、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第49-50页。

^② Arthur Mühlen-Schulte, “Full Faith in Credit? The Power of Numbers in Rating Frontier Sovereigns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by the UNDP”,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4, 2012, pp. 466-485.

^③ Charis Enns, “Knowledges in Competition: Knowledge Discourse at the World Bank during the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Era”, i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5, No. 1, 2014, pp. 1-20.

识时，它们更倾向于不明确表达意图，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由此可以看到，在前两种推广形式中，知识是作为客体由国际组织传递给受援国的，但后两种形式的推广则展现了国际组织的优势地位与知识本身的互构过程。基于权力类型学可以看到，这种互构过程根植于另外一种权力机制，即行为体的构成性运行方式。

表2 多边援助机构发展知识的主要推广形式及其所蕴含的权力机制

知识推广形式	所蕴含的权力机制	内涵	特征
强制	强制性权力	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受援国必须服从的一系列工具进行发展知识的推广，以此影响并塑造受援国的发展政策	通过明确意图表达
社会化	制度性权力	在多边援助机构的规则安排下，发展知识被受援国学习的过程	
定位	结构性权力	发展知识因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位差”而流向地位较低的一方，即受援国	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
定义	生产性权力	多边援助机构通过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话语，让受援国相关行为体认为其中关于发展的标准或指标是客观且自然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发展知识之所以通过特定形式推广，是因为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力互动模式，换言之，四种知识推广形式的背后是四种不同的权力互动机制。“强制”“社会化”“定位”与“定义”这四个命名也体现出发展知识不同推广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强制”指知识被视为实物，由国际组织借助工具将其传递给受援国。“社会化”指知识作为共识性的网络，将受援国中的各类主体笼络。“定位”指知识附着于不平等结构，从而流向处于较低地位的受援国。“定义”指知识被塑造为毋庸置疑的“客观”标准，从而为受援国所遵循。

正如四种国际关系权力并非独立存在，发展知识的四种推广形式也并非独自呈现。它们在实践中相互影响、相互联结并相互依托，共同构建了发展知识在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间的推广与接受路径。下文将以世界银行在秘鲁所推行的参与式预算为说明性案例，以证明本文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展现知识推广如何内嵌于权力互动。

三 案例阐释：秘鲁的参与式预算改革

参与式预算改革是 21 世纪初秘鲁国家民主化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始于 2000 年秘鲁结束藤森威权统治、进入政治重建之时。鉴于藤森执政时期秘鲁政府的高度腐败、权力集中和治理失效，新政府希望制度性地增进政府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于是将参与式预算引入其改革计划中。“参与式预算”倡议最先由巴西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提出，其基本内容是要求政府在预算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秘鲁新政府则将这一倡议引入国家层面，要求各级政府在预算制定过程中全面引入公众参与机制。2003 年，秘鲁国会通过《参与式预算法》，规定秘鲁所有大区、省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预算必须吸纳公民社会的意见。^①自此，秘鲁将参与式预算作为一项与国家发展相关的改革计划，在各级政府进行全面推广。

（一）秘鲁的参与式预算改革

秘鲁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其目的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支出的预算过程，以增强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与执行过程中的问责制，从而遏制腐败。2009 年，秘鲁政府修订《参与式预算法》，将执行过程划分为准备、协商、协调、定案四个阶段。在准备阶段，各级政府识别、登记并培训参与主体，这些参与主体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地方协调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在协商阶段，各参与主体根据发展规划讨论并确定项目优先级，再由技术团队对这些项目进行评估。在协调阶段，安排大区与地方政府领导人会面以确保项目支出可持续且能够产生区域影响。在定案阶段，通过投票最终确定投资项目清单并交由各级议会审批。^②秘鲁在国家层面推广的参与式预算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每年约有 15 万名参与主体参与相关预算流程。^③

世界银行在秘鲁参与式预算这一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国家改革计划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 1996 年参与式预算进入其视野以来，世界银行一

^{①②} Stephanie McNulty, “An Unlikely Success: Peru’s Top-dow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Experience”, i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8, No. 2, 2012, p. 2, p. 3.

^③ The World Bank, *Peru—Evaluación del Presupuesto Participativo y su Relación con el Presupuesto por Resultados*, Washington, D. C., 2011, p. 6. <https://documentos.bancomundial.org/es/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971021468085742271>. [2025-12-25]

直是参与式预算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世界银行主要通过资金支持、研究、培训和跨国合作等方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力推行这一治理工具及其配套的知识与理念。^①可以说，参与式预算作为一套完整的政策知识与政策工具，其在全球层面的扩散离不开世界银行的推动。

秘鲁参与式预算在全国层面的推广，与世界银行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尽管秘鲁在启动这项改革时并未直接受到世界银行的指导，但在之后的进展中，世界银行逐步深度嵌入秘鲁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意见咨询与政策知识提供之中，其关于参与式预算的意见在秘鲁政治改革的语境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2008 年之后，秘鲁尝试在参与式预算的整体改革中加入新项目“结果导向的预算计划”，并为此向世界银行寻求专业意见与研究支持。世界银行为秘鲁提供了研究报告，以指导该项目的推进。^②下文将阐述世界银行在秘鲁推广“参与式预算”这一发展知识的相关细节，并运用前述理论框架分析多边援助机构在发展知识推广过程中是如何与受援国进行权力互动的。

（二）世界银行如何在秘鲁推广“参与式预算”政策知识

世界银行在秘鲁进行“参与式预算”这一发展知识推广的过程中，同时使用了“强制”“社会化”“定位”和“定义”这四种形式。这四种不同的推广形式在多边援助机构（世界银行）和受援国（秘鲁）之间分别形成了“支配—服从”关系、嵌入制度与权力的关系性实践、不断自我生产的等级结构，以及与这一等级结构相互强化的话语。由此可见，发展知识的推广是经由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权力互动而实现的。

1. 强制：以参与式预算作为贷款的条件

世界银行在推广发展知识时，“强制”是其最为直接且显著的一种形式。“强制”表现为世界银行通过贷款条件、政策性附加条款等工具，要求秘鲁在接受资金援助的同时，采纳并实施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发展政策与知识体系。这体现了国际关系中强制性权力的行使，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服从”关系。

^① Benjamin Goldfrank,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8, No. 2, 2012, pp. 1–18; Osmany Porto de Oliveira, *Inter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mbassadors of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147–157.

^② Osmany Porto de Oliveira, *Inter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mbassadors of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56.

在秘鲁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中，世界银行通过向秘鲁政府发放“计划性社会改革贷款”（PSRL），将参与式预算的理念与实践作为贷款的先决条件，推动其在秘鲁国家层面落地。世界银行2004年发布的简报显示，在藤森政权倒台后的过渡期内，世界银行便通过这一贷款工具支持秘鲁政府推动治理方式改革，并使得通过这一贷款工具推动透明度与公众参与成为改革的共识。在这些改革中，参与式预算被视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①尽管起初秘鲁政府在部分触发条件上并未完全满足世界银行要求，但后来通过与世界银行协商，采取了追加措施进行补偿性处理。双方在此过程中皆具备协商与调整的空间，但世界银行对秘鲁接受参与式预算具有约束力。

参与式预算在秘鲁国家法律层面实现制度化，也离不开世界银行通过贷款等工具的推动。尽管在表面上秘鲁2003年的《参与式预算法》是由本国立法机构制定并通过，但这背后离不开世界银行的政策倡导与资金引导。有研究指出，“秘鲁成为全球参与式预算实践最为广泛的国家，其背后是世界银行通过数百万美元的计划性社会改革贷款予以支持……世界银行对秘鲁参与式预算的支持已成为其主导参与式预算在全球扩散的象征。”^②这表明世界银行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贷款协议影响了秘鲁的政策选择，有关参与式预算的政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具备制度上的约束力。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通过将参与式预算设置为贷款条件与政策先决条件，以强制的形式在秘鲁实现了该发展知识的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间的关系体现在强制性权力当中，即世界银行以提供政策知识的方式直接干预受援国的政策选择。

2. 社会化：塑造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共识与认知共同体

世界银行通过“社会化”这一形式系统地塑造秘鲁国内对参与式预算的认知与共识。世界银行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秘鲁的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和公众在观念上接受并内化特定发展知识，从而形成认知共同体。这一推广过程体现了制度性权力的运行方式，即世界银行通过搭建学习平台，对秘鲁国内的政策制定相关者开展技术培训，从而间接而持久地影响秘鲁的政策选择与执行方式。

^① Mariana Felicio and Indu John-Abraham, *Peru: Towards a System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2004, pp. 1-2.

^② Benjamin Goldfrank,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8, No. 2, 2012, p. 3.

首先，世界银行通过设立新的发展议程，引导秘鲁政策制定相关者对参与式预算的关注和认同。如前所述，在藤森政权倒台后，世界银行积极推动“社会问责”与“参与式治理”，使之成为秘鲁国家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世界银行将参与式预算打造为现代政府治理的“全球脚本”，以推动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银行通过在线课程、现场访问和出版物发行等方式提供有关参与式预算的专家建议。^①由此，世界银行塑造了参与式预算这一新的发展议程，以吸引秘鲁政策制定相关者的关注。

其次，世界银行通过设立多种学习平台与培训机制，以调查研究等形式使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专家建议向秘鲁技术官僚与政策制定者推广。在秘鲁的实践中，世界银行的参与式预算专家受邀至秘鲁当地对这一改革的进展进行调查研究，并为秘鲁官员提供进一步提升参与式预算改革质量的建议。^②在秘鲁的参与式预算实施数年后，世界银行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重塑这一模式的建议。^③由此可以看出，世界银行通过一系列与专家建议、当地决策者学习相关的机制，将参与式预算塑造为秘鲁国内社会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这一发展知识的认知共同体。

最后，世界银行通过技术援助项目，将参与式预算的操作理念与方法“社会化”到秘鲁的基层治理结构中。世界银行向秘鲁派遣专家团队协助设计参与流程，评估项目优先级并建立监督机制。这种技术性援助不仅是工具支持，更是一种知识嵌入的过程。苏珊·文森特在秘鲁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发现，尽管秘鲁民众对参与式预算缺乏热情，但他们仍被纳入项目评估框架中，学习如何将自身需求“翻译”为项目提案，这是符合世界银行标准与取向的。^④这种在地化的知识传递，使参与式预算从世界银行的外部理念转化为秘鲁地方治理的内部语言。

总之，世界银行通过设立议程、构建学习平台、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和实施技术援助等方式，系统地推动参与式预算在秘鲁的社会化进程，使参与式预算从世界银行的政策工具逐步转化为秘鲁国内政策精英与地方实践者的共

^{①②} Benjamin Goldfrank,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8, No. 2, 2012, pp. 8 – 12, p. 11.

^③ Osmany Porto de Oliveira, *Inter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mbassadors of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42.

^④ Susan Vincent,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Peru: Democratization, State Control, or Community Autonomy?”, in Focaal: *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Vol. 2010, Issue 56, 2010, pp. 65 – 77.

识性知识，在秘鲁国内塑造出关于参与式预算的认知共同体，从而体现出制度性权力在知识推广中的作用。世界银行通过制度打造与规则设定，间接而持久地塑造了秘鲁政策实践者的认知与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知识不再是通过权力直接推广的客体，而是成为一种内嵌于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关系性社会实践。

3. 定位：关于参与式预算的优势结构

除了“强制”与“社会化”这两种带有明确意图的推广形式外，世界银行在让参与式预算被秘鲁国内社会广泛接受的过程中，还通过“定位”与“定义”这两种更为结构性的形式实现了发展知识的深层渗透。后两种形式不再依赖于直接的干预或制度安排，而是通过不平等的结构性关系与话语体系，使参与式预算在秘鲁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治理工具。这一过程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下面首先分析“定位”这一形式如何推广该发展知识。

在秘鲁参与式预算改革中，“定位”这一推广方式依赖于世界银行与秘鲁之间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在这一结构中，世界银行凭借其在资金与知识上的优势地位，使其推广的发展知识自然获得合法性，并被处于劣势地位的秘鲁所接受。与“强制”和“社会化”的推广形式不同，这种基于结构的推广形式并非始于明确意图或表现为直接干预，而是依赖于结构本身所赋予的权力关系。

一方面，这一结构源于世界银行在资金与专业知识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使得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援助体系中处于“高位”。世界银行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还拥有庞大的研究团队与数据资源，能够生产并输出具有权威性的发展知识。^① 在秘鲁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中，世界银行向秘鲁提供“计划性社会改革贷款”，并为秘鲁“结果导向的预算计划”提供专家咨询。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世界银行与秘鲁之间资源与知识的不对称，由此世界银行具备了发挥政策影响力的结构性基础。

另一方面，这种等级结构在实践中也不断被再生产，塑造了世界银行与秘鲁各自的身份认知。世界银行通过发展话语体系将自身构建为“经验丰富的发展主导者”，而秘鲁则被定位为“需要外部指导的落后国家”。秘鲁在参

^① 宋锦 《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优势和主要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6期，第26-28页。

与式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参考世界银行提供的政策工具与建议，世界银行也由此产出大量的数据评估与研究报告。^① 持续的技术支持不仅强化了世界银行相对于秘鲁的优势，也使得秘鲁依赖于世界银行的知识供给，进而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其相较于世界银行的从属角色。通过这一等级制结构的再生产，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知识便在结构性权力运作下为秘鲁所接受。这种接受不再依赖于外部的强制，而是源于结构本身所赋予的权力。

4. 定义：关于参与式预算的话语

“定义”是与“定位”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推广形式。在秘鲁案例中，“定义”主要表现为世界银行通过构建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话语体系，使参与式预算在秘鲁被视为一种技术性的、理所当然的治理工具。这种推广形式依赖于国际关系中生产性权力的运作，即通过对需要发展的对象进行识别和分类，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知识和话语的再生产，塑造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各自的认知与行为边界。具体而言，本案例中“定义”的推广形式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世界银行将参与式预算进行技术化、指标化处理，赋予其“中立”“权威”的表征，以此在秘鲁的政策语境中获得权威。世界银行在评估秘鲁参与式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制定了项目成本门槛、受益人口比重等一系列技术标准与操作指南。这些技术标准被包装为“科学”“客观”的工具，掩盖了其背后蕴含的政治偏好与发展理念。秘鲁政府在应用这些指标时，不仅接受了其体现的技术规范，也内化了其代表的治理逻辑，即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基于技术规范所决定的效率与透明度。

其次，世界银行通过话语建构将参与式预算与“善治”“民主化”等更为宏观的概念和叙事进行绑定，为其赋予道德合法性。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参与式预算被描述为能够在民主社会中为公民和政府“赋能”以促进社会包容、增进社会活力的工具。^② 这种话语不仅影响了秘鲁国内的政策讨论，也塑造了秘鲁民间组织的参与动机。在秘鲁，许多民间组织之所以积极参与预算过程，是因为认同参与式预算所代表的民主价值。

可见，尽管参与式预算在形式上是由秘鲁本国立法通过并实施的，但其设计理念、操作流程与评估标准都深受世界银行的影响。秘鲁不仅接受将参

^① Stephanie McNult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Exploring Peru's Efforts to Engage Civil Society in Local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5, No. 3, 2013, pp. 72-80.

^② Anwar Shah (e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2007, p. 21.

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也接受了其所代表的治理理念，即公共决策应基于公民参与、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一接受过程既源于外部强制，也通过结构与话语的塑造得以实现和强化。

在秘鲁案例中，“定位”与“定义”这两种推广形式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世界银行通过结构性优势（定位）为其话语建构（定义）提供了物质与制度基础，而话语的再生产反过来又巩固了其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这两种形式的交织（国际关系中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的交织），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知识在秘鲁实现了深层推广并被逐步内化。这不仅揭示了发展知识推广背后的权力本质，更阐明了一个事实：国际组织并非中立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在推广发展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形塑发展知识的结构与话语，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受援国的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由此可见，发展知识的推广过程本身即蕴含着权力的运作过程。

四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知识推广蕴含于权力运行”的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了国际组织在发展知识推广中的角色、机制及本质。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强制、社会化、定位与定义这四种相互关联的推广形式，将特定发展知识植入受援国的政策实践。这四种形式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动态且互构的权力网络。本研究揭示了发展知识推广背后的政治逻辑，即国际组织的发展知识推广体现了其对受援国行使的不同类型权力。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提出发展知识推广的四种形式并指出它们如何在不同层面相互作用：通过“强制”设立准入门槛，通过“社会化”构建认知基础，通过“定位”确立等级结构，通过“定义”赋予话语合法性。由此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国际组织的知识推广过程即是权力行使的过程。换言之，知识并非权力作用下的客体，知识是与权力同构的。这正是本文使用权力类型学视角的合理性所在——以权力的形态揭示知识推广的本质，权力形态的不同决定了知识推广形态的不同。

第二，本文深化了对国际组织角色的认识，揭示了其作为“知识—权力复合体”的运行机制。秘鲁案例研究表明，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援助机构不

仅是资金和技术的提供者，也是塑造全球治理秩序的权力主体，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推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世界银行通过贷款条件行使强制性权力，通过搭建学习平台施展制度性权力，通过资源优势维持结构性权力，通过话语体系定义施展生产性权力。考察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使得国际组织隐藏在“中立的技术性机构”背后的多样化面貌得以展现。

第三，本文为理解发展知识的接受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受援国对发展知识的接纳不仅是基于技术效能或本地化适配的考量，更是在权力结构中被动定位与主动调适的结果。秘鲁案例表明，除了直接行动之外，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援助机构还可通过其结构优势与话语塑造，使参与式预算成为秘鲁的“必然选择”。这表明，发展知识的推广不仅取决于其内容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更取决于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话语建构。

当前，新兴国家正积极参与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在构建发展知识的尝试中，中国致力于推动更加平等、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辨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推广中的权力逻辑，有助于新兴国家识别过往知识推广中的陷阱，探索真正尊重受援国主体性的知识推广与合作模式。同时，新兴国家如何突破传统权力结构，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知识体系，成为当今时代关乎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唯有揭开传统多边援助机构知识推广的“中立”面纱，认清其背后的权力运行实质，才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走向更加公正、平等的未来。

(责任编辑 黄念)

o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its conceptual evolution , analyzes its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China ' 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actices , and explores China ' s representative practices and proactive responses under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orms. Theoretically ,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an active promoter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to a promoter of its international norm - setting , advanc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ssues through multilateral platform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improving the draft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normative basis for China ' 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forming structural synergy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rights with high consistency in policy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normative convergence , China responds to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it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universal norms. Going forward , China can coordinate normative , institutional and evaluation dimensions to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 optimize cooperation tool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 so a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high - qualit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Key words: right to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Chinese solution ,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57 The Dissemination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 by the World Bank: An Analysis from a Power Perspective

Li Junyang , Cui Yide

Abstract: Why do recipient countries adopt th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rovided by multilateral aid agencie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How is such knowledge disseminated v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aid has explored the production , reception and specific dissemination forms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 , it still lacks a holistic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clarif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power typ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 The study finds that multilateral aid agencies disseminate development knowledge through four mechanisms , i. e. , coercion , socialization , positioning and definition , which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four power interaction mo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amely coercive power , institutional power , structural power and productive power.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veal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 is inherently embedded in

the power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multilateral aid agencies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Taking the World Bank's promotion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development knowledge in Peru as a case, the paper further verifi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four mechanisms: making the adoption of such knowledge a loan condition (coercion), shaping a consensus and cognitive community o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ocialization), establishing a dominant structural system for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actice (positioning), and providing normative discour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definition). This case study concretely demonstrat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multilateral aid agencies in disseminating development knowledge in recipient countries through power dynamic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merging countries to explor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odels that respect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recipient countries.

Key words: multilateral aid, development knowledge, World Bank, power discours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Peru

77 The Reshap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Wang Wei

Abstract: The recently publishe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5 is a carefully crafted document intended to legitimize policy and influence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It explicitly proposes the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prioritize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marking a fundamental shift in US poli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Through discursive strategies such as threat narratives, historical analogies, and emotional appeals, the report portrays America's hegemonic approaches as necessary measures to address threats and defend sovereignty. Building on the interventionist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its various historical "corollaries"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rump Corollary" reinforces the US's exclusive regional claims under the "America First" doctrine. The recent reintroduction of this doctrin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US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signifying the complete silencing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views emphasizing rules, multilateral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within this policy agenda. However, the "soft law" nature of this strategic report means it will fac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ation. Firstly,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gencies, subsequent resource allocation is not guaranteed. Secondly, the inherent culture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will lead to "bureaucratic filtration". Furthermore, the resistance and soft balancing measures adopted b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re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will